

在苦难中寻求自我蜕变 ——《等待野蛮人》中的救赎之道

陆海霞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摘要] J. M. 库切的第三部小说《等待野蛮人》因其独特的寓言式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而备受赞誉。小说围绕着老行政官的遭遇,聚焦其内心世界,讲述他在面对苦难、身陷苦难时的伦理抉择与自我救赎。整个叙事通过大量独白和自我拷问,丝丝入扣地展现生命个体如何在苦难中从旁观者蜕变成播撒良知之种的殉道者。作者巧妙地用虚拟的帝国与历史、虚化的人物与情节,指涉人类所普遍面临的道德与精神困境,探索救赎之道,表达出对人性和道德回归的诉求与期待。

[关键词] 库切;《等待野蛮人》;苦难;道德困境;救赎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3-0079-04

《等待野蛮人》是当代南非白人作家 J. M. 库切的第三部作品,是其“灵魂飞跃”的硕果^[1],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与深邃的思想内涵的完美融合为作者首度赢得国际声誉。小说采取了寓言般的叙事方式: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被虚化,故事主要围绕老行政官深邃的内心思辨而展开;小说的时间界限被模糊化,没有确定的时间。而苦难,即痛苦的经验,则成为小说中关乎时间的叙事线索,贯穿小说始终。乔尔上校对野蛮人的审讯、老行政官与盲女的相处、老行政官入狱后的经历,无一不与痛苦相关联。苦难将故事前后连成一线,痛苦的体验与救赎结为一体。故事中的苦难在寓言式的叙事中指涉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类生存困境。那么,面对苦难人的精神归宿以及如何在苦难中寻求自我救赎便是作者试图在小说中探讨的重点。因此,库切把关注的焦点更多地投向个体生命面临苦难时所作出的心理反应与伦理抉择上,并以此来揭示苦难之根源,探索救赎之道。

小说从老行政官的视角,呈现“文明”帝国的野蛮行径给野蛮人、老行政官乃至当地居民所带来的苦难,展现老行政官如何在苦难中寻求自我救赎:在旁观苦难、解读苦难、亲历苦难的过程中,经受良心的责难、内心的煎熬和灵与肉的激烈冲突,最终

坚守道德良知、实现自我蜕变。老行政官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完整地诠释了个体生命在遭受难以逾越的苦难及道德困境时的内心煎熬与精神困顿。通过聚焦老行政官的内心世界及其变化过程,小说不仅再现了“帝国”历史造就的种种苦难,而且深入探索了苦难中个体生命的伦理抉择与救赎之道。本文以苦难为切入点,聚焦老行政官从旁观苦难到身历苦难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的激烈碰撞和灵魂的蜕变,揭示作者借主人公的蜕变过程意欲传达的救赎之道,挖掘小说中蕴含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伦理价值。

一、救赎的前奏: 旁观苦难,背负良心的责难

苦难,即痛苦的遭遇与体验,既指身体上遭受的折磨,也指心灵所受的痛苦。《等待野蛮人》中,苦难贯穿小说叙事始终。帝国是苦难的制造者,野蛮人与老行政官是苦难的承受者。野蛮人的苦难来自于酷刑对身体的折磨、对生命的戕害;而老行政官的痛苦来自于旁观他者苦难而产生的罪感,这负罪感令他饱受内心的折磨。

帝国是苦难的炮制者,其代表——乔尔上校一行人的到来昭示着苦难的开始,苦难首先降临在帝国的敌人——野蛮人身上。帝国凭借“野蛮人威胁

[收稿日期] 2018-11-15

[作者简介] 陆海霞(1978—),女,湖北咸丰人,讲师。

论”，对其实施抓捕，对被捕者施以酷刑。乔尔到小镇的当晚就展开审讯，在密室中对一老一少的野蛮人（一桩抢劫案中的嫌疑犯）进行严刑拷打。老行政官并不赞同乔尔的做法，但作为帝国的下属官员，他无法公然反对，只得将祖孙二人移交给乔尔。起初，老行政官只是作为局外人而旁观苦难的发生。“事后人们说起听见当晚从谷仓传出叫喊声，我却一点也没听到……我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耳朵甚至调试到专门聆听人类痛苦的音频。但谷仓是一幢大建筑……不会因为某处有某人在喊叫而停止的。”^{[2]6}显然，他在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而酷刑的惨烈程度远远超乎他的想象，老者被折磨致死，年轻男孩被打得奄奄一息。老行政官走进密室，目睹暴力折磨下血肉模糊的面孔和残缺不全的肢体，良知被唤醒，内心被深深地刺痛。这种痛源于对他者的痛苦的喊叫的忽略，对“召唤”的无所作为。他的旁观使野蛮人的苦难定格为无法改变的现实，已成历史的苦难将他抛入无尽的自我良心责难之中。

苦难继续蔓延，老行政官背负着良心的责难，深陷道德困境的漩涡。乔尔坚持“痛就是真相”，借助痛来寻找“真相”，即“通过肉体上的痛苦折磨使蛮族部落从灵魂深处顺从和屈服”。^[3]而老行政官，作为“文明人”中的觉醒者，意识到帝国“文明”的荒谬性的同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对帝国的荒谬行为愤怒无比；另一方面，作为帝国下属官员，他无力阻止苦难的发生，只能任由事情发展，听天由命。乔尔上校迅速行动，亲自带兵围捕野蛮人，四天后第一批被捕的野蛮人被送回军营的院子里，随后乔尔又亲自带回一批被铁丝栓着鼻子的野蛮人。老行政官清楚地知道乔尔抓来的是一群毫无反帝国意图和计划的土著渔民和游牧部落，深知帝国行为的荒谬与暴力的本性，拒绝与乔尔同流合污。他为帝国的行为感到蒙羞，“这些事、这种对死亡的深深冷漠给我带来无比的羞愧”^{[2]31}。他表面面对事态“听而不闻”，实则内心却充满不安。挥之不去的不安将他席卷进无边的痛苦中，“就像被一股海底逆流紧紧裹挟住，不想挣扎，停止游动，面对辽阔的大海和死亡听天由命”^{[2]30}。良心的负罪感搅得他寝食难安、束手无策，因此他采取逃避的方式来摆脱帝国给他带来的痛苦。在野蛮人受审的五天里，他躲到了旅馆的妓院，逃离他者痛苦的呼唤，麻痹自我的神经。然而，逃避只是暂时的摆脱，并不能成为救赎之道。回到苦难的场景中，面对满目疮痍，他只能幻想乔尔等“丑陋的人们”能从地表消失，帝国能建立在没有痛苦和不公的土地上，以此

来慰藉受痛苦折磨的心灵。

无辜生命遭受苦难和惨死唤醒了老行政官的良知，自己对苦难的无所作为使他背负良心的责难、遭受内心挣扎的精神痛苦，他者之苦难与自我之罪感拼凑出救赎的前奏曲。小说叙事聚焦于老行政官内心的挣扎与痛苦，细致描述良知如何在旁观他者的苦难中被唤醒，良心如何在道德的困境中遭受责难，揭示了帝国主体对野蛮人他者生命的戕害，充分展现了作者对苦难的关照，对苦难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关注。

二、救赎的启程： 解读苦难，孤独自省

蛮族祖孙的惨痛遭遇唤醒了老行政官的良知，良心的觉醒带给他的更多是负罪与痛苦，并非救赎之念。而与蛮族盲女相处彻底唤醒了老行政官的救赎之念，开启了他灵魂的救赎之旅。在与盲女的相处过程中，他不断陷入伦理沉思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的拷问、反省，逐渐走出以自我为中心主体思维，走向他者，从而踏上自我的救赎之途。

蛮族女孩是乔尔抓捕回的游牧部落中的一员，她和父亲同时被捕，父亲在乔尔的酷刑下丧命，而她的腿被打瘸，眼睛被烫瞎。老行政官把在街上乞讨的她带回家，不仅是出于同情，也是出于好奇，因为她不单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弱者，还是苦难的遭遇者——那段秘密审讯的亲历者，他坚信女孩的身体里隐藏着有关过去的秘密，他想要借助与她的相处来解读已成历史的苦难的真相。老行政官把她带回家后，首先对她的伤口进行了清洗，酷刑留下的伤痕是暴力最有力的见证。“我心里的念头越来越明确，非要弄清她身上这些伤痕的来历不可，否则我不能放她走。”^{[2]46}他每晚对盲女身体进行仪式般的清洗，多次询问女孩眼睛在审讯中致残的细节，试图通过回忆当初的情景来还原历史的真相，还试图通过进入女孩的体内来探索身体的秘密。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表明了老行政官想要追回历史真相、寻找苦难之根源的意图，同时暴露了他想要同化他者的企图，这种想法源于传统哲学中的“同一”思维模式，即“通过置入一个对存在的理解进行确保的中间项和中立项而把他者还原为同一”^[4]。然而，所有在盲女身上找回历史的真相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沉浸在对女孩身体清洗的节律中，却总是在清洗过程中或完成后睡去；亲口询问致残细节，都被女孩以沉默的方式拒绝；努力回忆当时的细节，头脑中却一片空白；进入了女孩的身体，换来的却

是更深的自责与痛苦。历史的真相成为永恒的空白，历史已成为过去无法捕捉，而历史之痛永远横亘在当下挥之不去。

库切笔下的老行政官具有强烈的自省意识，一种敏于反省的自我批判意识。在尝试探索历史真相、解读苦难的同时，老行政官总是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与孤独自省。最初，他把女孩带回家，习惯性地将她置于“他者”的位置来审视，试图将其纳入自我的知识范畴来把握；对其进行洗礼仪式，企图将她同化到“文明”世界中来；将其身体当成考古的物品一样，试图从中找到历史的真相与线索。^[5]同时，强烈的自省意识使他陷入道德的困境中，驱使他不断地进行自我拷问与反思，逐渐意识到自己对盲女假意的亲昵行为跟乔尔的暴力行为实质上并无差异。乔尔用暴力来寻求真相，而“我的行为似乎像个情人——我脱光她的衣服、擦洗她、抚摸她、睡在她身边——但这跟把她捆在椅子上打她没有什么两样”^{[2]63}。通过对帝国及自我罪行的审视，他者的痛苦之根源以及自我对他者负有的伦理责任逐渐在老行政官脑海中显现：“在我床上的这个身体，我对它负有责任，或是似乎应该负责，否则我为什么留它在这里？”^{[2]64}至此，老行政官的思想意识发生了转变——对自我与他者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意识在他送女孩回自己部落的途中通过不断地自我拷问得以明确、深化：“她身上的伤疤把我吸引到她身边，而我又失望地发现自己不能洞察事情的原委……我想要的是她还是她身上带着的历史痕迹？”^{[2]96}在自我拷问中逐渐明朗的意识使老行政官的灵魂拯救之旅有了明确的航向。

与盲女的相处无疑也是关联着痛苦的：盲女遭受肉体的痛苦，老行政官内心也遭受着痛苦的煎熬。但正是这种痛苦，不断地将老行政官引入灵魂深处的反思，反思触发思想意识的根本性转变——从将他者视为自我认识的知识范畴向自我对他者负有不可逾越的责任的认识转变，推动他正式踏上了自我拯救之路。西方传统哲学将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强调对他者的征服，“而库切更关心的却是如何通过唤醒对他者的伦理责任意识来打破这种对立的主客体关系”^[6]。在小说叙事中，库切用大量的笔墨去描写老行政官对帝国及自我主体思维的反思，揭示文明思维的荒谬，把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作为老行政官的精神救赎之道，不仅为小说增添了丰富的伦理意义，也建构了一种精神的救赎之道：打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出自我中心，走向他者，担负对他者的伦理责任。

三、救赎的完成：

身历苦难，实现灵魂的蜕变

如果说旁观野蛮人的苦难使老行政官陷入道德的困境，遭受良心折磨和内心挣扎之痛苦，思想意识在不断的自我拷问中转变，那么他自己亲历的苦难则使他切身体验到暴力对人性的摧残，经受身心的双重考验，灵魂在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中逐渐完成蜕变，升华出神圣的自我殉道之举。

老行政官因将盲女送回家而获罪入狱，在大牢中，他陷入更深层的自我反思中。被拘禁的老行政官不再是帝国权力体系中一员，以囚徒身份遭受与盲女同样的折磨，再次反思自己对女孩的行为动机，洞悉自己在他者身上寻求“赎罪”“修复”的安身之处的不良成分。身处蛮族父女当初饱受酷刑折磨的地方，他不断在脑海中还原女孩及其父亲被乔尔虐待的细节，试图重新勾勒当时的情景：在这封闭的囚室，暴力无限制地施加在他者的身上，人性被肆意践踏，生命在权力的荼毒下不得不承受无边的苦难。受禁在此的老行政官不仅遭受身体的限制与折磨，更要忍受精神上的孤独，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担忧，害怕“像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不明不白地在羞辱中死去”^{[2]139}。两个月之久的孤独囚室时光几乎让他精神崩溃。而此时他面临另一重道德困境——身体的痛苦与灵魂的冲突。他一度为了逃离死亡与痛苦而逃出大牢，但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游荡和心理斗争之后，他又重回囚室，最终，灵魂深处对道德的坚守战胜了对身体痛楚和死亡的恐惧。

正是这种坚守道德底线的意识升华，老行政官最终从一个苦难的旁观者彻底蜕变成一名充满人性与道德之光的殉道者。乔尔上校对一群抓回的野蛮人实施集体拷打，暴力拷打从密室走到大庭广众之下，士兵们用警棍狠狠捶打野蛮人赤裸的背脊。帝国的子民将这样的暴力场面当作“新奇难得的视觉大餐”，流露出“好奇至极的神情”，以欢呼声对应每一轮的重棒敲打，甚至轮流参与对野蛮人的拷打。这种暴力场面的描写令人触目惊心，权力机制对弱者实施的暴力不仅是对人性的践踏，也是对人的心灵的污染，帝国子民道德意识的麻木与缺失充分反映了集体无意识式的暴力。只有老行政官拒绝与眼前的残暴行径沆瀣一气，虽然他深知自己势单力薄，无力阻止暴力的继续，但道德良知使他不再逃避或旁观苦难的蔓延，“我救不了那些囚徒，干脆，自己救自己吧”^{[2]152}。在乔尔举起锤子的当头，他大声地喊出了“不”，在众人面前公开为了人道和正义而与帝国权力为敌，从旁观者蜕变成正义

捍卫者。他的正义之举没能唤醒众人的良知,无法拯救野蛮人的生命,反而使自己陷入被拷打者的他者境地。至此,小说叙事进入高潮,苦难的呈现也到达极致。苦难加倍地降临年迈的老行政官身上:遭受毒打而遍体鳞伤,穿着女人的衣服被吊在树上而受尽凌辱。昔日受人尊敬的老行政官被剥夺了做人的基本尊严,降格为动物般的存在。老行政官的苦难遭遇不禁让人怀疑:正义的思维是否还能在世间存在?对此,库切并未作出任何主观的评断,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并不为特定的群体发声。我对自由有一种亲近感,我再现人们的身影——挣脱枷锁,面朝光明。”^[7]这一点在老行政官面对苦难时所作出的伦理抉择中得到很好的诠释:在伦理受难中挣脱精神的枷锁,实现自我的救赎。

人的精神归宿正是作者在《等待野蛮人》中所关注的。一方面,作者以受难情节呈现人生惨淡的境遇,控诉权力机制对他者生命的戕害,引发人们对人性的深思;另一方面,作者始终不忘在黑暗的背景上涂上一抹光亮,老行政官身上所呈现的自省意识和道德觉悟以及他所完成的自我救赎正是人性和伦理在苦难中的修复,寄寓了作者对人性的美好期待。由此,作者心中理想的救赎之道便跃然纸上:在苦难中锻造自我,对良知的坚守、对他者的负责成为走出道德困境和祛除内心罪感的可行之道。

四、结语

《等待野蛮人》不失为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完美结合的一部佳作,寓言式的叙事方式与宏大的伦理主题融为一体。它以虚构的帝国与历史、虚化的人物与情节、模糊的时间界限,讲述一个寓言般的故事,却饱含作者对人性的苦苦追问、对灵魂救赎

的深入探索。“其政治、伦理批判不仅适用于历史,也适用于当代乃至未来。”^[8]寓言般的故事折射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黑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而模糊的时间界限指涉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生存问题。库切始终坚守作家的社会良知与责任,在创作中关照苦难、再现弱势群体的惨烈遭遇、关注个体的精神归宿、探索灵魂的救赎之道;其作品不仅回响着警醒世人的警钟,而且永远散发出人性的光辉,赋予主人公独特的自省意识,展现如何在苦难中寻找自我救赎,在道德与良知的坚守中建构救赎之道。

〔参 考 文 献〕

- 〔1〕王敬慧.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5.
- 〔2〕J. M. 库切.等待野蛮人[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6.
- 〔3〕蔡圣勤,谢艳明.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433—439.
- 〔4〕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M].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
- 〔5〕陆海霞.超验他者视角下的他者表征——库切小说中的他者问题研究[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44—48.
- 〔6〕史菊鸿.从苏珊的“实体”问题看库切的主体观[J].外国文学评论,2016(4):215—228.
- 〔7〕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341.
- 〔8〕张旸.论《等待野蛮人》的救赎政治[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8(1):71—75.

(责任编辑:程晓芝)

Seeking Self-transformation in the Abyss of Bitterness

——A Way of Salvation in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LU Hai-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0)

Abstract: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the 3rd fiction of J. M. Coetzee, wins worldwide award for its unique allegorical technique of narrating and profound ethical thoughts. The book, focus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old executive officer and his inner world, tells about his ethical choice and self-salvation while faced with and stuck in the abyss of bitterness. Through a great number of monologues and self-interrogations, the whole narration appropriately reveals how an individual transformed himself from a bystander into a martyr of morality in the abyss of bitterness. By Skillfully employing a virtual empire and history, virtual characters and plots, ambiguous time and space, the writer refers to the universal moral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human, aims to explore a way of salvation and expresses his appeal and expectation for the regain of human nature and morality.

Key words: Coetze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Bitterness; Ethical predicament; Salvation